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5)

# 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5)

# 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 / 复旦大学历史系,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5)

ISBN 978-7-5325-7958-7

I. ①近… II. ①复… ②复… III. ①物质文化—研  
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563 号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5)

## 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2.5 插页 5 字数 393,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58-7

K · 2157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编者的话

所谓“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指涉范围囊括一切日用物品,即一种文化中所生产的“物质”产品。这些日用物品既可以是大规模生产的、俯首即是的,也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工制作的;有的是身份与社会阶层的象征,有的只是必要的工具甚至玩具。一种物质或物品的文化,不仅诉说着一个特定时空的故事,更是关于那些制作人和使用人的故事,其中还包含着时间的流逝和变迁。

“物质文化”在西方成为一个学术名词,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之间。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不像其他研究领域那样可以勾画出学术发展和重要研究者的谱系,它是在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内独立生成的,更接近于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这些不同的领域包括了艺术品收藏与鉴定,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科技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等。这些不同的领域和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只是到了最近二十年,研究“物”在文化中的角色才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

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渐趋独立,与对消费行为(consumerism)的研究密切相关,特别是其中关注普通人日常物质条件的部分,与社会史、文化史最具亲缘关系。法国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曾说过,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是一种重新发现问题的方法,它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传统的

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就是说,把物质生产放到文化和精神的历史中去考察,将生产和消费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此,在文化研究中,物的地位和功能得到了重新审视。

如果我们将视线拉回到中国,可以发现中国的经史考据传统中不乏对“物”的研究。名物制度的考辨是小学的主要内容,而文人的雅文化传统滋养了自成一格的古物鉴赏的文物目录学。然而这与现代学术范畴中的“物”的研究并非一回事。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形成期,物质作为“文明/文化资料”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得到学者的重视。中国新史学的重要奠基者梁启超就曾提出需要进行“文物专史”的研究。梁启超提倡的专史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要“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的目的”。在现代史学规范看来,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史,或者说由人类精神活动所主导的普遍历史。<sup>①</sup>尽管此处的“文物”二字与“物质文化”在内涵上有所不同,梁氏把中国的近代化概括为在“器物”、“制度”乃至“文化”层面上渐次受到西方刺激而自我改革的过程,<sup>②</sup>这一经典的中国近代历史“三期说”,依旧昭示了对物之研究在中国现代历史学范式中所应占据的一席之地。物的历史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以物的演变为线索,亦可贯穿政治组织、社会经济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诚如现代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沈从文所指出的:“一切生活器用绝不孤立存在,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会忽然绝迹。……”且“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都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的宝藏”。对于现代历史学家而言,综合运用文献和文物,由事物的发展变更而触及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一种新的方法。因此,“去研究文物中丝绸、陶瓷、家具、字画和铜、玉、漆、竹、牙、角

器等”，甚至“在目下还有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用“联系和发展上下前后四方求索方法”，就会发现以往不被意识到且不宜着手的问题，比如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sup>③</sup>

尽管如此，1949年以来，在以政治史为研究主干的中国史学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胡道静先生仍在呼吁“加强和推广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sup>④</sup>他对于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呼吁，特着眼于对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成果的总结与研究方面，主要在发掘与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演进脉络，联系和协调科技史与整个学术发展的关系。因此，他坚持人文研究要文、史、哲、科“四科”并提，即人文的研究当与科学的维度结合起来，在历史研究方面除了纵向以时为序的“纵四史”（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还要有按门类划分的“横四史”（中国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科学史），而“横四史”中尤以“科学史”最为薄弱。

最近二十年间，物质文化研究正在从冷门转向热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物质文化研究热，渐次席卷了欧美中国研究（包括汉学），乃至港台和大陆历史学界，不仅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议题和对旧有议题的检讨，而且激发了学者对过去中西学术传统中“物”之研究的再思，笼而统之，此可谓一次学术典范上的“物质文化转向”。

这一典范转移，首先起自对于近代早期全球货物流通的研究，藉此重新探讨欧亚之间以及亚洲内部的交流，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对中西学界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东西二元论”提出了具体的批评，从物质相互交流、影响乃至融合的角度为一种全球视野的新历史书写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由全球货物流通的历史，旁及“消费社会”（consumer so-

ciety)兴起的命题。有关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消费革命与消费文化出现的历史追溯,涉及奢侈品观念变化、贸易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作用、消费观的性别转向等对现代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的诸多问题。有关近代早期全球物品流通史与欧洲消费社会兴起这两个研究议题共享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风”,亦即十八世纪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舶来品。有关中国物品在欧洲消费社会诞生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实际上为近代中西社会的物质变化和发展道路的分殊提供了新的比较研究的视野。

在本世纪之初,台湾学术界受到欧洲史上有关消费社会的研究与理论的影响,开始对明清时期围绕“奢靡”社会风气的大量论述与实践层面的材料进行挖掘与整理,为我们揭示了明清士人与庶民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姿,为明清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提供了生动的佐证,并对流行时尚与消费行为所折射出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消长提供了分析的可能。<sup>⑤</sup>在此基础上,台湾史学界形成了一股强调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议题的集体研究风气,特别是在明清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消费观念、器物与文化记忆、城市生活等问题的个案研究。不过其中,有关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研究在数量上显著少于有关十六到十八世纪的研究。在欧美,有关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的研究亦相形匮乏。

对此,国际汉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物质文化的先驱——柯律格(Craig Clunas)认为,问题首先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因为西方研究者普遍重视物品的消费而非生产,所以在观察到十八世纪后亚洲制造品在欧洲物质文化领域中数量减少的现象后,便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物质交流已经不再构成值得重点研究的对象。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即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的结局默默地从历史图景中消失了,而当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大量物品重新充斥西方市场和日常生活时,这种历

史研究的空白和断裂就显得十分突兀。<sup>⑥</sup>另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则指出,研究者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体验缺乏研究意识,恐怕是因为在描述中国现代化历程对本土社会文化的影响时,仍然不自觉地采取西方中心的立场,故而并没有对西潮东渐过程中中国人对外来物品的创造性容受给予足够的重视。<sup>⑦</sup>

在此背景下,本辑所收录的专题论文与域外专论,力图从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展现近世中国社会变迁中人与物关系的细微变化。按照日常生活展开的逻辑,讨论现代化浪潮下中国人在衣食日用各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和特殊的消费体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展现目前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前沿话题,本辑所录文章在时段上采取广义的“近世”概念,而不局限于十九、二十世纪。

本辑所录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研究认为,物并不只是任由我们塑造的惰性客体。物所承载的意义超越其实用功能时,便摆脱了单纯由人塑造的客体性,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这最为明显地反映在奢侈品上。物质文化研究,聚焦于物品如何获得社会性意义,以及个体如何获得对自身有意义的物品,在此层面上,也就成为了关于物本身的生命史(或传记)的研究。对于奢侈品如何获得意义的研究,亦即对于精英阶层品味与社会身份形成的研究。十五至十七世纪,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圈内,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上其他时期人类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程度。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在十六世纪中国商品经济日趋兴盛的背景下,艺术品消费的崛起。鉴藏,作为一种奢侈性消费,成为了文化精英超越政治秩序变动而塑造自我认同的重要社会性活动。他通过家产清单、笔记、日记等材料,披沙沥金,为我们讲述了明代江南士人收藏了什么、如何收藏、从何收藏的故事,力图重建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形成的初期,其本土精英文化孕育

的物质基础与生活空间。

延续有关精英品鉴文化的话题,陈建守和林秋云的文章都讨论到花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意义发生与迁移,并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谱录这一特定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陈建守梳理了晚近中外有关中国花文化的主要研究,并将自己的个案研究聚焦于“牡丹”在明清文化脉络中的多样面貌,力图展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作为“物”的牡丹如何与人发生“交往”,产生意义。今人多易在有“国色”之誉的牡丹与盛唐气象间发生联想,而经作者的爬梳,牡丹与相近种属的芍药分离而逐步珍品化的过程却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牡丹的文化资本的累积本因其珍贵难得,也正因其珍贵,激发了人们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对其进行“驯化”。明清时期牡丹知识的系统化,与牡丹栽培技术的进步和种植范围的扩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牡丹并未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普及化而导致其“珍品”的文化意义与地位的失落,反而在清乾隆时期得封“花王”之殊荣。作者认为,这得益于历代孜孜不倦编纂牡丹谱录的文人雅士。士人的博雅传统并不停留在感官的层次,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人与物的交感相通。这种人与物的交感,恐怕更多地得到了文本经验而非现实经验的支持。如作者所揭示的,明清时期的牡丹谱录,不断复制与强化唐宋时期有关牡丹的文学作品与史事典故,从而延续了牡丹专属的文化感觉。

林秋云的文章同样围绕“花谱”这一文本的形成与演变,条分缕析地呈现了近世中国士人品鉴文化的另一种脉络。作者发现自宋代开始的,以谱录之学来记录和呈现士人看花、种花与写花的活动,构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植物学与园艺学的花卉品鉴之学。这种为花卉修谱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所不同的是,品鉴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植物,而旁及于优伶艺伎。在相同的“花谱”之名下,前者是以人喻花,区分花卉的色香品格;而后者是以花喻人,品

藻媚优的姿貌技艺。花谱在明清之际的起落,与士人冶游风气的盛衰密切相关。在其盛极一时的晚明与清中期,坊间触目皆是,年年岁岁出新编。美人与名花在谱录之学的共通的文本类型与语境中,发生了互映互证的联系,是揭示中国传统审美中写物而移情与写人而物化的一个佳证。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中国的目录学传统中,记物的“谱录”与记人的“谱牒”分属不同的知识系统,谱录之学体现了士人雅文化中的游戏心态,自唐宋以下,其品鉴赏玩的对象从诗、画到植物、古玩,逐步扩大,因而出现了各种诗谱、画谱、砚谱、墨经、茶经、金石录、考古图等。明清品伶、品妓的“花谱”,更是将玩味美色变为士人公共活动和士文化公共知识的组成部分。它们将描写的对象异化为纯粹审美的客体,与为自然界客观之物注入道德话语的“香草美人”的文人传统大异其趣,但仍然有别于低层次的身体欲望的满足。晚明以来品鉴优伶的谱录之学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兴盛,实际上反映了文化消费中士商地位的竞合给士人带来的身份危机感,而以谱录之学来守护一种客观审美的立场,无形中成为了明清花谱创作者的深层心理动机。

消费文化与都市生活景观是研究近代中国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近代中国口岸社会率先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从而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门户。冯客的文章从比较研究与批判性的视角,总括了这一研究主题所涉及的理论层面的问题,可作为本辑中提纲挈领的文章。作者特别关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同社会文化的“杂交性”,如何体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看来,全球化重塑中国人生活的速度和程度,恐怕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中国来体验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异域风情的外国人,不断被自己目睹的景象所震惊,而固执地在霓虹灯外的世界寻找所谓“真实”的中国。他们所拒绝的是都市景观与城市生活所带有的一切现代化的表征,而这最典型地体

现在口岸社会对舶来品的消费中。西方观察者把这种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者说“非中国化”,然而在作者看来,消费文化带来的不是简单粗暴的文化同质化,他更倾向于相信一般大众创造性地调动自身的文化经验,为外来的物品与本土的社会形态找到有机的结合点,这便是“现代性的本地化”过程。作者企图向我们证明,关注“普通人的文化”,亦即本地人群对全球化商品的创新性适用,可以成为探寻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另一条蹊径。

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和黄薇的文章均涉及近代中国人服饰消费与风尚的转变。两位研究者分别从“传统服饰的再发明”和“外来服饰的输入”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中国人应该穿什么”的问题。日常着装体现了人的意识与观念,是社会文化、礼仪和交流方式的综合反映,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其变化尤为鲜明而曲折。西式服装的输入与融合,既是中国近代都市的靓丽风景,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都市群体的不同着装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强势外来文明的理解和自我文化身份的再确认。

黄薇选择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前线的两个特殊群体——来华外国传教士与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作为考察对象,对西式服饰及其背后蕴藏的西方观念如何涓滴渗透至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中,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作者认为,晚清西方传教士虽然为传教事业的需要,会不同程度地采取融入地方习俗的着装策略,但仍有不少传教士坚持穿着西装。他们在外形上给华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生活方式与卫生理念上也颇具示范效应,因此在伴随清末政治剧变而来的服制革命上,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民国以后,教会在学生服饰的管束上体现出强烈的宗教与道德规训色彩,相形于瞬息万变的都会时尚,反而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文化保守力量。作者认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人生活巨变的曲折。

安东篱则将性别研究引入到近代服饰史的研究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动荡政局中,都市女性着装问题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被各种政治与道德话语所利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排满革命成功后的十几年中,原本性别定位为模糊的满族服饰“旗袍”,经过改良,迅速取代了以汉族“上衣下裙”为基本特征的“五四装”,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都市女性的时髦装束,不啻是时尚界的一场反向的革命。“旗袍”的时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围绕女性身体解放的观念与物质上的变革。女子剪不剪短发,束不束胸,这些今天看来只是个人审美偏好的问题,在二三十年代却一度成为性命攸关的政治事件。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曲线毕露、花样繁复的“旗袍”颇多诟病,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也是社会道德批判的对象。然而,今天,“旗袍”却成为了彰显中国女性仪态风姿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遗产。中国女性时尚在过去百年所历程的风云变幻,如何不教人唏嘘感叹。

林郁沁(Eugenia Lean)、曹南屏、葛淑娴(Susan L. Glosser)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现代化浪潮中新技术、新事物如何嵌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与商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林郁沁研究了陈蝶仙(1879—1940)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及日用工业知识方面的努力,这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两套丛书——《家庭常识汇编》和《实业致富丛书》。陈蝶仙兼具实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小说家等多重身份,一般读者恐怕对他创作的言情小说多少有所耳闻,但鲜少有人会注意到他在民国时期一手创办的辐射中国与东南亚的制药王国——“家庭工业社”,以及他在致力于实业之余,所进行的科普写作与出版。二十世纪涌入中国的大量工业制品,在改变中国人物质生活面貌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新生事物真实性与可靠性的不安。随着现代工业规模化生产的普及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冲击,媒体与资本结合而营造的话语迷障,本土与西方

知识体系的权势竞合,不仅使中国人的日常消费被前所未有地政治化(比如抵制外货和提倡国货的各类社会运动),而且令他们在构建与现代工业化进程相辅相成的现代科技知识体系时纠结不已。如何鉴别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如何在物质与信息被机械复制并急速膨胀的时代不至于迷失方向?由知识精英转变为商业精英的陈蝶仙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文本策略”——编著类书。编纂类书是儒家知识精英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维持日常秩序与知识权威的重要手段,也是十九世纪政局板荡中中国知识精英接引“西艺”、“西政”等新知识的主要途径。在面对一个由科学与工业塑造的崭新的物质世界时,投身民族工业的中国知识精英,采用编纂策略来规范工业知识,并通过报刊专栏与丛书来集中展示“实验”成果,以此为自己的产品验明正身,确立合法地位。陈蝶仙最初在自己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开设“家庭常识”专栏,刊登了大量有关工业产品自制方法的文章,后结集为丛书出版,十分畅销。此外,陈蝶仙又出版了《实业致富丛书》,手把手地传授读者如何在模仿外国实业技术的基础上制造本土产品,把“舶来”的日用化工产品变为“国货”。这些日用科技丛书在普及外来新知的时候,也用自己的分类体系对外来知识进行了“驯化”,并服务于本土的工业化实践。

民国时期的“家庭工业”概念及其所反映出的人们对工业生产知识的浓厚兴趣,着实令今天已高度依赖商品化市场的人们感到惊讶。编者寄望于专栏读者能成为未来的实业家,投身民族工业的建设。曹南屏对近代中国玻璃制造业发展史的研究,则将目光由民国上移至晚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并举的时代氛围。玻璃一度是明清宫廷内造内用的赏玩之物,故旧名“料货”,而与晚清由西洋传入的窗、镜、盛器等日用玻璃制品相区别。起初玻璃也只是达官贵人享用的奢侈品,清末民

初才进入寻常百姓家。由于玻璃制品的普及,生产的本土化也成为了国家挽回利权的当务之急。作者着重指出,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兴起,究其思想渊源,乃是晚清知识精英对中西“器物”层面差距的反思逐渐从军事工业的范畴扩大到民生日用品之上。日用品中洋货泛滥,直接刺激了士人对工商立国的策略思考。因此,玻璃制造首先纳入了清末官办工业的范畴。然而,由于技术上的瓶颈,中国的本土玻璃制造业星散于西化程度较高的沿海与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且产品种类与规模参差不齐,特别是平板玻璃的生产鲜有成功者,不得不长期依赖欧洲与日本的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华经济势力显著提升,日制玻璃大举入侵中国市场。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在华军事影响的扩大,中国玻璃制造业的重镇——山东更沦入日本的势力控制范围,这一度激发了广东、江浙等地本土企业的危机感与竞争意识。总体而言,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动荡局势中,本土玻璃制造业尽管肩负“挽利权杜漏卮”的国家使命,却始终未能在欧、日产品挤压的有限市场空间中谋得真正的发展。

葛淑娴有关日占时期上海华商乳品业的研究,接续了曹文有关日常物品消费与生产的政治语境的讨论。和玻璃一样,牛奶曾受到了解外部世界的中国商业精英的高度重视。作为在现代化和公共卫生理念兴起背景下引入中国的一种食品,牛奶被二十年代的商业话语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被塑造为中国进步求存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到了抗战时期,在食物短缺的孤岛上海,外国人、日本医院和中国富裕阶层对牛奶的特殊需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并促进了牛奶消费的增长。作者通过对上海市牛乳场联合会档案的解读,发现沦陷时期的上海商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利用将牛奶等同于现代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与伪上海市政府、工部局、日本占领军等多方政治势力

展开博弈,不仅为企业自身的发展争取了空间,而且提高了乳品消费的普及程度。如作者所言,战时上海乳品业的曲折故事,可以披挂上不同的政治色彩。在华人乳品商的笔下,这几乎是一种由救世热情支持的民族事业。然而,在敌占区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与日本人的妥协合作又令其沾染了通敌嫌疑,从而其身份变得暧昧。无论如何,牛奶这一被赋予特殊政治色彩的食品,在一个特殊政治年代的故事,使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商业文化的活力与灵活性有了更为复杂的认识。

赵婧与潘玮琳的研究,从本土与外来两个角度,呈现了转型时代新旧事物的曲折命运。赵婧关注的是西药催产素被引入中国后,对中国女性分娩行为方式的冲击。在中国,对分娩过程进行干预的医药措施古已有之,传统的催产方法有一些是日常经验的总结,一些则出于对物物相感的泛灵信仰。这些手段的存在,说明了分娩风险的普遍存在以及传统医药对难产问题的重视。现代人工合成的催产素发明于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在二十年代便出现在中国医药市场上。作者通过对二十年代报纸医药广告的研究,发现催生素在中国的推广几乎与欧美同步。最初引入的德国拜耳药厂生产的“赫破弗辛”(垂体后叶激素),其主要作用是刺激子宫收缩,加快分娩进程。但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医药文化语境,广告宣传用的却是“子宫补药”、“妇科圣药”等说法,后来的改良版用的也是“卧褥定”这样近乎“物物相感”理念的名称。与本书其他个案研究所揭示的情况相似,在催生素的生产上,也存在着国货药商的后来居上以及与中外药商的市场竞争。为了凸显国产催产素的疗效,传统的接生方式和民间偏方、验方往往被视作反面教材,于是,一套有关生育卫生的现代知识体系伴随医药市场的兴起而被建立起来。与商业营销中的现代医药话语形成对照的是,至少在五十年代以前,多数中国产妇仍然遵循着传统的居家分娩的知识与习

俗,采用西法接生的比例少之又少。中医的催生药方多数取材于常见草药,甚至来自于日常饮食。作者发现,传统分娩方式的风险性未必如西药广告宣传的那样,反倒是西式催产素在临床应用上存在误用与滥用的风险,甚至引起过轰动一时的催生伤胎案。西式催产素的引入,颠覆了中国人对分娩的理解,生产过程从一种自然的生理事件变成了需要药物与医疗手段干预的疾病,医生与助产士被赋予了掌握孕妇生死的权力。这一个案研究揭示出,由于增加了资本在医药市场上的逐利冲动,现代生育科学的引入,并非纯粹的技术与观念更新,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的道德风险因素的滋长。

潘玮琳的研究以锡箔这一特殊纸钱的生产与消费为视点,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反迷信运动与宗教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国家通过限制宗教消费品的生产、流通来改革社会习俗的经济干预措施。锡箔是将锡块打成薄片后裱裱在竹纸上而制成的。由于原料与工艺的复杂性,锡箔的制造在历史上成为了中国一些地方的特色产业。江浙一带的锡箔业产销网络以绍兴、杭州、上海为中心,在十九、二十世纪形成了对地方经济与社会颇具影响的产业,也成为反迷信运动中最受瞩目的对象之一。作者发现,对使用锡箔的社会批评使锡箔业这一本来不为人所知的行业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民国时期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评论更揭示了锡箔生产各个环节不为人知的复杂面向。作者通过对各种零散史料的爬梳,力图展现锡箔业的原料与生产工艺,其生产中的社会分工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作者认为,尽管现代国家的反迷信话语将锡箔业塑造成一种落后、衰败的地方产业,实际上,它的产销却拥有一个成熟而活跃的网络,其原料来源、生产工艺与产业结构已深深嵌入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构成了一种自成一体的地方性知识。与以往有关近代中国风俗改良的研究不同,作者以物为研究中心,强调宗教消费首先是一种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行为决定了锡箔这类

纸钱必然要进入流通领域,从而获得一种商品的属性,这也是锡箔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依然释放出巨大活力的原因所在。作者认为,以焚烧锡箔为代表的使用纸钱的社会习俗之所以难以禁止,除了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经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上述研究所涉话题与领域非常广泛,而其问题意识的内在联系又如草蛇灰线,伏延可追。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采取了“推物及人”的视角。正如英国著名物质文化研究学者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所言,这种视角的创新之处恐怕“并不在于研究方法上,而更在于对文化本质的认识”,通过对物的具体研究,我们得以认识不同社会 and 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这些日常生活之物的网络,是人们“赖以建立自身真实世界的具体方式”。<sup>⑧</sup>

由一物的历史,见微知著,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将社会经济研究和微观史研究方法注入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物质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物具有经济性、象征性双重意义:经济性是因为物作为商品,是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其象征性则表现在物的社会意义和围绕商品的交易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推物及人”的新研究视野,已经并将持续激活对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思与辩。我们将此编主题定为“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即着眼于此。

本辑前言由潘玮琳撰写,章可参与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周永生同学帮助校订全稿。在此谨向所有作者、译者和帮助本辑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谨识

---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②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年),刘东、翟奎凤选编:《梁启